

中國國民黨山西省黨部研究 ——以組織、人事為中心的考察（1938-1944）*

梁馨蕾**

摘 要

抗戰爆發後，閻錫山與國民黨中央聯合抗日關係的達成，使國民黨黨部得以重回山西。但周旋於國民黨、中共與日本之間的晉閻勢力，也自發組建了具有地方政黨性質的組織——民族革命同志會，與各方力量相抗衡。蔣介石為維持合作局面，試圖通過在黨務發展與人事派遣等事項上的較大讓步，借以換取晉閻一方安定。在這一過程中，國民黨山西省黨部書記長黃樹芬在加強蔣閻聯絡、調和山西黨政軍關係，以及化解地方衝突等方面均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對以黃樹芬為代表的國民黨中層黨務幹部個人仕途升降的考察，也有助於理解這一時期戰爭局勢的緊張、地方實力派強烈的離心傾向，甚或是國民黨內暗流湧動的派系鬥爭。

關鍵詞：閻錫山、蔣介石、民族革命同志會、山西省黨部、黃樹芬

* 收稿日期：2018年6月20日，通過刊登日期：2019年4月29日。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一、前 言

抗戰爆發前，「晉閻」與「滇龍」作為兩個離心力較強的地方實力派，耗去了蔣介石（1887-1975）許多精力。抗戰爆發後，彼等雖做出與蔣介石共商大計、支持抗戰的姿態，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始終貌合神離。對於雲南王龍雲，蔣主要擔心其與汪精衛政權合作。而山西王閻錫山（1883-1960）所處環境則更為複雜，身邊同時環繞著日本勢力與中共力量，就連閻也自稱是在「三個雞蛋上跳舞」。¹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如何處理與閻錫山的關係，不僅牽動著整個華北戰局，亦會對日本、中共方面產生影響。反之，戰爭進程、日本與中共動向，也考驗著閻錫山對國民黨的向心力。而國民黨組織在山西的生存與發展狀況，則是這一系列錯綜複雜關係的直接反映。

中原大戰後，山西的國民黨組織，與其說是反覆地間歇性發展，不如視為蔣、閻關係分合的象徵標誌。閻錫山獨立態勢強烈時，國民黨黨部遭到驅逐。而當關係緩和時，黨部又獲許存在。抗戰期間，閻氏與國民黨中央的若即若離，使雙方關係變得微妙而富有張力，充滿值得深入探尋的空間。學界既有研究，從軍事戰略、政治體制等層面對蔣、閻、共、日四方關係，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考察。²但除此之外，閻錫山還通過發展地方「組織」與蔣介石相博奕。蔣亦

¹ 程子華，《程子華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頁 102。

² 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參見：曾華璧，《民初時期的閻錫山（民國元年至十六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1）；季林（Gillin, D. G.）著，牛長歲等譯，《閻錫山研究——一個美國人筆下的閻錫山》（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0）；吳振漢，《國民政府時期的地方派系意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張冠軍，〈犧盟會與共產黨及閻錫山政權關係之辨誤〉，《晉陽學刊》，2005 年第 4 期，頁 7-9；金以林，〈寧粵對峙前後閻錫山的反蔣倒張活動〉，《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5 期，頁 50-89；馬義平，〈民國時期山西黨政關係演變管窺——以山西省黨部委員構成為例〉，《歷史教學》，2009 年第 12 期，頁 26-30；黃天華，〈抗戰期間閻錫山與日本的關係及國共兩方的因應〉，《民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輯 22，頁 154-164；牛貫傑，〈民族革命同志會初探〉，《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15 年第 9 期，頁 10-16；劉文楠，〈尋找理想的中央—地方關係——蔣介石與晉綏地方實力派的博奕（1931-1934）〉，《史林》，2015 年第 5 期，頁 139-155；馬思宇，〈有財斯有兵——1928~1930 年蔣閻關係再解讀〉，《史學月刊》，2016 年第 8 期，頁 76-84；賀江楓，〈1940-1942 年閻錫山與「對伯工作」的歷史考察〉，《抗日戰爭研究》，2017

運用各種手段，對閻施予拉攏與牽制。本文擬將民族革命同志會（以下簡稱「同志會」）、國民黨山西省黨部，以及書記長黃樹芬（1902-?）居於其間的主要活動作為研究對象，嘗試從省級地方組織與人事的視角出發，對抗戰時期閻錫山與國民黨的關係進行再探析。

二、國民黨在晉生存實態

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山西代表鄧鴻業、苗培成、趙連登等人出席會議。³數人回到太原後，開始祕密籌建山西的國民黨組織。1926年5月，國民黨山西省黨部正式成立。⁴6月，閻錫山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後，省黨部與山西軍政關係開始步入正軌。但此後國民黨在晉發展可謂命途多舛，形勢的優劣主要取決於閻錫山與蔣介石或國民黨中央的關係。

1930年，閻錫山與馮玉祥發動中原大戰聯合反蔣，並下令關閉國民黨山西省黨部，使之不得不暫時遷往天津。閻氏倒蔣失敗被迫離晉後，省黨部才得以返回太原，重新開展活動。1931年8月，閻錫山私自潛回山西，蔣介石曾多方設法再次將其驅逐出晉。同時，閻也在祕密聯絡改組派、川、粵等地方力量反蔣。總體而言，中原大戰使晉閻實力受挫，國民黨暫時佔據上風。但「九一八事變」的爆發，瞬間扭轉了這一格局。

日本的侵華舉動使太原學生抗日情緒高漲，紛紛舉行罷課遊行。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出面鎮壓時，學生穆光政遭遇槍殺，釀成「一二·一八慘案」。⁵由此，更加激起山西民眾義憤，促使運動愈演愈烈，進而搗毀了省黨部。先前一直靜待時機的閻錫山也迅速出擊，借助民怨打壓山西的國民黨勢力，不僅拘捕

年第4期，頁99-126；王奇生，〈閻錫山：在國、共、日之間博弈（1935-1945）〉，《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頁87-104。

³ 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山西代表共六人，分別是鄧鴻業、苗培成、趙連登、谷思慎、韓書麟、劉景新。〈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單〉，收入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頁61。

⁴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山西通志·黨派群團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989。

⁵ 相關研究參見：趙妍杰，〈穆光政之死：九一八事變後蔣、閻關係之變動〉（未刊稿）。

了省黨部委員及工作人員，更使省黨部迫不得已再次關閉，遷往北平辦公。⁶國民黨山西省黨部既已離晉，縣及以下基層組織的生存環境更無從保障。於是，閻錫山成功利用穆光政事件，又一次驅逐了國民黨在晉組織。

一二八淞滬戰役爆發後，閻錫山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委員、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重掌軍權。閻氏東山再起後，制定了省政十年建設計畫，專注於山西的政治、經濟建設。面對日本對華北的日益蠶食，閻錫山表面雖完全擁護蔣介石的重大決策，實則奉行的卻是「防共防蔣」路線，對國民黨中央殊多防備，周旋於國、共、日各方勢力之間。與此同時，閻錫山也迫切希望加強對山西農村資源的控制與利用。自 1935 年起，閻因欣賞中共在鄉村的組織動員模式，著手借助薄一波等中共人士籌建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以下簡稱「犧盟會」），作為招募、宣傳、動員和組織民眾的重要機構，並發展了一支新的軍事力量——新軍。由此，閻錫山在擁蔣前提下，也與中共在山西建立起聯合抗日關係。⁷

1937 年 7 月，「盧溝橋事變」後，全面抗戰爆發。閻錫山受任為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紅軍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進入山西作戰，國共合作抗日局面在山西形成。11 月，忻口戰役失敗後，太原失守，閻錫山率領軍政機關撤至臨汾。翌年 2 月，日軍大舉南侵，在八路軍、新軍與晉綏軍等聯合打擊下，山西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但面對日軍的步步進逼，和借助新軍與犧盟會在山西逐漸發展壯大的中共勢力，閻錫山也愈發感受到自身在晉統治地位岌岌可危。

1938 年底，閻錫山為爭取蔣介石援助，同意了國民黨中央恢復山西省黨部的要求。⁸至此，在外流亡八年的黨組織得以重新回晉。但國民黨方面仍採

⁶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山西通志·黨派群團志》，頁 990-991。

⁷ 楊奎松，〈閻錫山與共產黨在山西農村的較力——側重於抗戰爆發前後雙方在晉東南關係變動的考察〉，《抗日戰爭研究》，2015 年第 1 期，頁 4-39。

⁸ 省黨部離開山西後，國民黨親閻人士組成「中國國民黨山西黨員通訊處」，與中央維持微弱聯繫。1935 年，山西省黨部又從北平遷至河南開封。1938 年，再度流亡至陝西西安。參見李冠洋，〈中國國民黨山西省黨部簡述〉，收入《山西文史資料》編輯部編，《山西文史資料全編（第 1 卷）》（太原：《山西文史資料》編輯部，1998），頁 1049；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山西通志·黨派群團志》，頁 990-991。

取謹慎態度，在省委人事任命上儘量爭取閻錫山好感。時任中央組織部長張厲生向中央黨部秘書長朱家驊（1893-1963）表示：

黨務無論矣，即現在衛副司令長官俊如，在晉作戰區域內之政治黨務，以及民眾組訓工作，亦無權過問。其與中央部隊接近之縣長、專員，皆被撤職。山西問題，仍不脫閻先生服從領袖，而軍事政治，壹惟閻先生之自由支配，雖中央亦不得過問。⁹

鑒於閻錫山在晉一家獨大態勢，省黨部重啓之初，蔣介石傾向直接由閻兼任主任委員，以謀求第二戰區黨政軍關係協調。但朱家驊的意見與蔣相左，推薦起用趙戴文。爲此，蔣令朱先向閻錫山徵求意見。¹⁰孰料，閻回覆力推陳公博出掌山西黨務。而在此之前，汪精衛已有令陳主管四川黨務之意。¹¹蔣雖爲迎合閻錫山，命中央黨部另行物色川省人選，但實際忌憚倘若真派陳公博主持山西省黨部，會使中原大戰時閻錫山聯合改組派「倒蔣」的故事重演。因此，陳公博赴晉之議並未實現。最終，國民黨中央依朱家驊提議，任命趙戴文擔任山西省黨部主委。趙戴文爲閻錫山幼年教師，據接近閻、趙者稱：

閻每次發動不當行爲，趙必挽之，使入正軌。閻亦因此遇有做作，輒避免趙之耳目，以防其阻遏。趙之關係於閻之政治生命於此可見。但趙始終爲閻之忠實部下，閻雖過錯百出，而趙決不至於離閻也。趙舊學甚佳，晉人頗多敬之者。¹²

國民黨中央最終選定趙戴文出任主委，應是想利用其德高望重的地位，不僅能夠修飾國民黨在晉形象，而且在對閻錫山以示拉攏的同時，也期望趙能對閻起到一定規誡作用。此外，另有一重要考量。趙此時年逾七十，擔任省政府主席，雖實際職權由閻錫山掌握，但尙具名譽之銜。趙受精力所限，勢必無暇

⁹ 〈張厲生致朱家驊函〉（1938年8月28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0，「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人事」。

¹⁰ 〈朱家驊致閻錫山電〉（1938年8月11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0，「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人事」。

¹¹ 〈朱家驊致張厲生函〉（1938年9月1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0，「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人事」。

¹² 《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295，「各省市路黨部人事分析」（時間不詳）。

顧及省黨部事務，從而給國民黨方面更多自主性。而事實也大體如此，據報告：「黃書記長執會務全責，趙主任委員遠居克難坡，從未到過省部，大權集於書記長。」¹³由此觀之，趙戴文出任省黨部主委可以成爲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緩衝，無疑是蔣、閻雙方均能接納的最佳人選。

彼時，第二戰區司令官部與山西省政府均遷至克難坡，而省黨部則設於陝西宜川的秋林。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視察員認爲該省黨部所處，「既非晉省境界，又非省府所在地，對於地方黨務既不便於指揮，且與主任委員不能時常商討問題，急應移入晉境，以利工作」。¹⁴雖然省黨部與軍政機關分處兩地，不利於密切黨政聯繫，但也給了省黨部些許自由伸展的空間。

1938-1944 年，山西省黨部書記長均由黃樹芬擔任。1932-1936 年，黃曾先後擔任交通部會計科長與浙江郵檢所主任，而朱家驊在此期間則分任交通部長與浙江省政府主席，二人交誼淵源頗深。黃在給朱的電報中曾寫道：「論黨之組織，係統吾公及芬之直接領導者。論私之關係，不獨爲數十年來之長官。而今後事業上尤須賴提繫扶植。」¹⁵抗戰之初，黃樹芬被軍委會派至山西擔負特工任務。1938 年 4 月，朱調任中央黨部秘書長後，黃作爲其心腹與舊屬，在國民黨人事派遣極爲注重「人地相宜」的情況下，雖籍屬廣東，仍被繼續留任山西。¹⁶這不僅表明黃樹芬深得朱家驊器重，也反映出受朱氏信任的幹部群體中缺乏晉籍人士的窘態。

¹³ 〈王貢猷致朱家驊函〉（1943 年 5 月 13 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0，「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人事」。

¹⁴ 〈視察山西省黨務報告摘要〉（1939 年 6 月），收入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3），頁 309。

¹⁵ 〈黃樹芬致朱家驊電〉（1943 年 1 月 25 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0，「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人事」。

¹⁶ 抗戰之初，國民黨中央在恢復山西省黨部的同時，還命中統局建立了「晉特室」，後改稱「山西省黨部調查統計室」，黃樹芬擔任首位主任。彼時，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雖由 CC 系人士張厲生擔任，中統事業亦向來被 CC 系壟斷，但黃樹芬因曾涉足調統事業而與彼方關係曖昧。這使黃在被朱家驊保舉出任省黨部書記長時，也較易爲 CC 系接受。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山西通志·政法志警察篇》（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28。

1939年12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召開後，朱家驊取代張厲生轉任中央組織部長。該部作為專司國民黨地方黨務人事調派的機構，掌握著各省黨部委員的薦免權。1942年春，朱家驊為增強國民黨在晉組織力量，也為擴充自身幹部隊伍，相繼向山西省黨部派遣了兩名己方執委：胡作礪與高挺秀。該年底，省黨部改科設處，最重要的秘書、組訓與宣傳三處處長便分別由黃、胡、高三人兼任。¹⁷相較於抗戰時期其他省分，山西省黨部的執委構成較為簡單，CC系與黃埔系勢力尚未涉足，朱家驊系執委可以大體代表國民黨中央在山西省黨部內的全部人事力量。1942年前後，山西省黨部執委身分屬性如下表。

表1 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執行委員（1942年前後）

| 姓名 | 職務 | 勢力派別 |
|-----|---------------------------|------|
| 趙戴文 | 省黨部主委、省政府主席 | 閻錫山系 |
| 黃樹芬 | 省黨部書記長、省黨部秘書處長 | 朱家驊系 |
| 邱仰濬 | 省黨部執委、省政府委員、民政廳長 | 閻錫山系 |
| 劉冠儒 | 省黨部執委 | |
| 李江 | 省黨部執委、省政府委員 | 閻錫山系 |
| 楚溪春 | 省黨部執委、第二戰區副參謀長 | 閻錫山系 |
| 武誓彭 | 省黨部執委 | |
| 薄毓相 | 省黨部執委、省政府委員、教育廳長 | 閻錫山系 |
| 胡作礪 | 省黨部執委、省黨部組訓處長 | 朱家驊系 |
| 高挺秀 | 省黨部執委、省黨部宣傳處長 | 朱家驊系 |
| 王友蘭 | 省黨部執委 | |
| 梁縉武 | 省黨部執委、第二戰區黨政分會秘書主任、閻錫山五妹夫 | 閻錫山系 |
| 梁敦厚 | 省黨部執委、省政府委員、閻錫山表侄 | 閻錫山系 |

資料來源：《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06-295，「各省市路黨部人事分析」（時間不詳）；劉壽林等編，《民國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900。

¹⁷ 〈王頁猷致朱家驊函〉（1943年5月13日），《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06-090，「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人事」。

雖然朱家驊一方把控了省黨部的主要職權部門，但閻系執委人數在省黨部中居絕對優勢。以上表情況為例，即便朱氏已藉機安插了胡作礪與高挺秀二人，閻系執委依然佔據 11 個編制的 6 席，其餘 3 名則是不受閻信任的地方人士。6 名閻系執委雖均身兼軍政要職，多無意於黨部職權，但省委人事構成依舊反映了中央與地方權力結構對比，可以從中窺探出國民黨在晉力量虛實。

山西省黨部內，中央與地方兩方力量對比懸殊，除因閻錫山在晉軍政權勢甚大外，亦與蔣介石這一時期對閻採取的主動示好、遷就態度有關。1940 年，蔣曾簽發手令，直接插手山西人事：「聞王用賓之子現在山西任黨務工作，言行不慎。未知彼係擔任任何項任務，應速將其調回中央，不得再留山西。」並嚴令：「以後凡與閻長官意見不合之人，皆不可派往山西工作，以免引起誤會也。」¹⁸王用賓係國民黨政要，曾擔任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長，其子王昉彼時被派任山西省黨部執委。王昉被撤後，中央組織部改派山西省三青團幹事郭澄接任。郭到任未久，黃樹芬就致函朱家驊秘書沙孟海：

查郭同志原任山西青年團幹事，因結黨營私已由中央團部調回。今復改派為黨委，恐晉省黨部將從此多事矣。閻、趙□前□電保薦楚溪春補缺，未為採納。今發表郭澄，閻、趙均表不滿。¹⁹

朱家驊閱覽黃樹芬信後，在回覆中聲明郭澄先前並非因案調回，爾後也是因閻中央團部將派其返晉，中央組織部才加派其兼任省委。²⁰隨後，因團方對郭澄另有任用，中央組織部才依晉方意見，以第二戰區副參謀長楚溪春補充其執委空缺。上述既已論及山西三青團，在此便稍做延伸，對三青團山西支團部人員安排做簡要回顧，藉以更加完整地反映抗戰期間閻錫山與國民黨中央的人事博奕。

1938 年底，山西支團部籌備時，閻錫山曾向蔣介石建議人選。蔣遂囑團中央組織處代理處長康澤：「對山西可例外一點，尊重地方的意見，以免做不

¹⁸ 〈蔣介石致朱家驊、馬超俊手令〉（1940 年 8 月 29 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0，「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人事」。

¹⁹ 〈黃樹芬致沙孟海函〉（1941 年 3 月 20 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23-559，「人才人事：黃樹芬」。

²⁰ 〈朱家驊批註〉（時間不詳），《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23-559，「人才人事：黃樹芬」。

通，不過，我們還是要有幾個人在裡面。」²¹於是，中央團部指定薄毓相、陳魯仲分任主任與書記，負責籌備山西三青團。幹事為梁敦厚、李江、郭澄、李猶龍、黃樹芬、李潤沂。²²由此可見，團方人事構成也極為遷就閻氏。次年，山西三青團內，薄毓相與梁敦厚發生衝突，人事需做調整。閻錫山又向中央提出兩個原則：切實密切中央與地方聯絡，勿引起第二戰區內部摩擦。並推薦由趙光庭任主任、郭澄任書記長。²³朱家驊分析認為，趙、郭先前均為改組派，但已與汪精衛脫離關係，現立場甚接近中央。既然二人由閻錫山提出，似可照派，亦可消除薄、梁間衝突。於是，朱分別致電三青團中央書記長陳誠與康澤說明情況。²⁴

若結合省黨部恢復之初，閻錫山對陳公博的推薦，不難發現閻在處理國民黨在晉組織與人事時，青睞具有改組派背景之人。而汪精衛出走河內後，與其脫離關係者，國民黨中央也有意吸納。因此，這類人選往往成為閻氏與國民黨雙方均能接受的對象。

國民黨中央雖在人事安排上基本滿足了閻錫山要求，但在山西的組織發展並不順利。早在國民黨醞釀重回山西時，張厲生就預見到未來公開發展組織的艱難前景：「該省環境如此困難，所謂八路軍又從而蠱惑利用，隱憂甚大，不容忽視。然中央必須下一決心，於普通辦法以外，另謀培植實力之道，即秘密發展組織是也。」²⁵朱回應道：「囑調統局切實規劃後，即派幹員前往進行，一面設法成立青年團。」²⁶

²¹ 康澤，《蔣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黨衛軍」魁首康澤自述》（北京：團結出版社，2012），頁 89。

²²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山西通志·黨派群團志》，頁 999。

²³ 〈劉奠基致朱家驊電〉（1939 年 10 月 1 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509，「三民主義青年團：人事介紹與任命」。

²⁴ 〈朱家驊致陳誠、康澤電〉（1938 年 10 月 7 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509，「三民主義青年團：人事介紹與任命」。

²⁵ 〈張厲生致朱家驊函〉（1938 年 8 月 28 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0，「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人事」。

²⁶ 但此後，國民黨對晉政策未見有所更張，黨團的實際生態環境是：「黨的方面是誰要動誰即是共，結果本非共黨亦排成共黨。」三青團在山西的地位更還不如黨部。〈朱家驊致張厲生函〉（1938 年 9 月 1 日）、〈王貢猷致朱家驊函〉（1943 年 5 月 13 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0，「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人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下略），《徐永昌日記（第五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1939 年 8 月 3 日，頁 107。

至 1939 年 6 月，省黨部已恢復工作半年，僅向 17 個縣派遣了書記長，尚有 80 個縣未成立黨部。這其中固然受時局所限，省境內部分地區被日本與中共勢力佔據，使國民黨黨務推展受阻。但僅山西省黨部所在的宜川、秋林兩地，設立黨員總報到處後，二十天內報到者不滿百人，徵求新黨員工作也未著手辦理。此外，省黨部剛經恢復就有尾大不掉之勢，人員超編且支出過巨。為應酬人事，不僅特設秘書三人，更增設警衛二十餘人，且多非黨員。科長以上人員月薪高達八十至百元，較之省政府職員高出一倍以上。但各縣書記長月薪僅十五元，生活尚不能維持，推動工作更無從談起。再至各區指導專員多未能按期赴區工作，「或永不到職，或自令不相當之人代理，甚或按月領款，而從未推動工作。」²⁷

三、以會制黨：閻錫山與同志會

國民黨重回山西後的發展績效不彰，一方面受制於戰局，另一方面也與晉閻的抑制有關。抗戰前，閻錫山就有仿效中共的組織模式，發展犧盟會的舉動。至 1939 年時，犧盟會已漸有被中共把持之勢。第九十三軍軍長劉戡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談到：犧盟會是閻領導下類似政黨的組織，「不過既沒有主義為中心思想，又沒有正確的理論以領導行動，完全跟共黨的尾巴走，這是非常危險的。他將這政治集團之網張開了，是否能收得回來，尚是一個問題，以現在的情形觀察，就有尾大不掉之勢。」²⁸因此，即便犧盟會阻礙了國民黨在山西的發展，但閻錫山與中共的關係正漸趨膠著，蔣介石遂暫未採取任何措施，只是靜觀其變。

此時，由中共主導的犧盟會不僅侵佔了山西的政治軍事權力，在領導、組織各級救國會，廣泛訓練、吸收幹部，組訓民眾等方面，也近乎取代了國民黨

²⁷ 〈視察山西省黨務報告摘要〉（1939 年 6 月），收入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頁 308-309。

²⁸ 〈國民黨中執委秘書處轉發犧盟會組織與活動公函〉（1939 年 6 月 7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南京：鳳凰出版社，1998），第五輯第二編政治三，頁 440-441。

組織在基層的作用。²⁹因此，閻錫山對中共通過犧盟會向山西滲透與擴展勢力的舉動大感恐慌，並急欲擺脫這一被動局面，重新掌握犧盟會與新軍。

其實，早在 1938 年初，閻錫山就已認識到自身處境，開始有所準備。太原失守後，閻率兵轉移至臨汾，面對軍隊潰敗、組織癱瘓的境況，亦深恐犧盟會大權旁落，決定暗中另起爐灶。閻借第二戰區抗戰工作檢討會之機，召集山西高級幹部一百餘人，發起成立了同志會，作為統一領導第二戰區軍政民工作的集中組織。³⁰但直至同年 7 月，同志會仍處祕密、觀望階段，未公開掛牌。期間，礙於犧盟會的地方威望，同志會亦未著手建立區縣組織。

但自 1939 年 4 月起，隨著中共在晉西活動日甚，與閻錫山頻頻發生摩擦，促使同志會全面啓動，開始祕密發展會員，作為對犧盟會的反制。³¹為此，閻錫山首先授意軍政長官，利用同志會名義統一切組織，犧盟會在名義上須受該會領導。其次，將全省劃為五個軍區，由己方將領統轄。再者，改編決死隊以削弱犧盟會武力。最後，組織敵工團、突擊隊、精神建設委員會等組織作為同志會下設機構，以與中共及犧盟會鬥爭。³²閻錫山另起爐灶的作法，使其與中共的對立態勢漸趨明顯。1939 年 12 月，「晉西事變」的爆發，便是雙方合作關係破裂的標誌。³³

²⁹ 〈國民黨中執委祕書處轉發犧盟會組織與活動公函〉（1939 年 6 月 7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政治三，頁 440。

³⁰ 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第五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1938 年 2 月 16 日，頁 2076；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頁 242。

³¹ 楊懷豐，〈閻錫山的民族革命同志會紀述〉，《山西文史資料》（太原：山民人民出版社，1965），輯 11，頁 50-51。

³² 〈黃樹芬呈蔣中正共黨在山西之活動及其勢力閻錫山態度及其應付方法〉（1939 年 12 月 1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300-00049-048。

³³ 關於犧盟會建立與發展的歷史經過，以及這一時期閻錫山與中共關係的研究，可參見楊奎松，〈閻錫山與共產黨在山西農村的較力——側重於抗戰爆發前後雙方在晉東南關係變動的考察〉，《抗日戰爭研究》，2015 年第 1 期，頁 4-39；賀江楓，〈1940-1942 年閻錫山與「對伯工作」的歷史考察〉，《抗日戰爭研究》，2017 年第 4 期，頁 99-126；王奇生，〈閻錫山：在國、共、日之間博弈（1935-1945）〉，《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 1 期，頁 87-104。

此外，對抗中共僅是閻錫山成立同志會的動因之一。自 1938 年底，國民黨組織重回山西後，閻亦欲採取措施對黨務發展加以制約。既然己方對犧盟會的控制被中共動搖，那就另立組織，維護自身勢力。先前的犧盟會已對國民黨在晉發展造成阻礙，同志會的出現使山西政治環境變得更加複雜。閻錫山的這一動向也立刻引起了國民黨軍統的警覺，戴笠向中央報告了「民族革命同志會最高幹部會議」的召集情況：

- (一) 確定同志會為核心領導組織。
- (二) 同志會之名稱主張公開，但組織須秘密。
- (三) 民族革命青年團之負責人均須為同志會之會員。
- (四) 發動一百萬民眾，普遍建立游擊根據地。
- (五) 決定在五月十五日以前將會員總數統計完竣，各級選舉限六月十五日以前一律辦妥，將當選代表名單呈報代表大會，大會定於七月七日開幕。³⁴

對於閻錫山大肆發展同志會的行為，蔣介石在日記中痛斥：「閻以大一統為遺毒與中心思想之曲解，其卑劣甚於共黨，其破壞三民主義之罪惡為不可恕也。」³⁵即便如此，蔣也僅暗中抱怨，並未公開採取措施。徐永昌則感慨：「共產黨賴政治工作以生存以擴大，閻先生賴政治工作以防共以整軍，中央何至不能用政治工作以抗倭以蹙共。」³⁶但徐也對閻的另造勢力不以為然：「按今日閻先生做法，在冀、察、魯、蘇、浙、贛、鄂、皖等省，皆應如彼辦理，乃不此之圖，輕信輕言，殊對不起國家，對不起同事。」不過，徐又轉念論定，此種組織成不了若何氣候，「閻之機關黨，所謂犧盟會、公道團等，與民十八啓予之興中學會性質高的有限，皆隨現地位以進，與官同其運命者，有何可懼。正國家危急之今日，樂得利用之工具耳」。³⁷

³⁴ 〈賀耀組、戴笠致蔣中正電〉（1939 年 4 月 29 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80200-00522-024。

³⁵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9 年 7 月 10 日，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³⁶ 《徐永昌日記（第五冊）》，1939 年 6 月 30 日，頁 88。

³⁷ 「啓予」即指商震，「興中學會」是 1929 年前後，商震與若干黨人成立的小組織。目前因缺少相關材料，具體情況不詳。《徐永昌日記（第五冊）》，1939 年 6 月 26 日，頁 84-85。

相較於徐永昌，稍遠離國民黨政治核心的人士對閻錫山的離心傾向也有所耳聞，但此時似乎尚不清楚同志會的建立，仍將犧盟會作為談論對象。1939年10月，剛從蘇魯等省視察歸渝的梁漱溟，在向陳克文、甘乃光等人談起山西情形時認為：「閻現時以第三者自居，既不附共產黨，亦不表同情於國民黨，他所組織的犧盟會儼然國民黨與共產黨以外的一個政黨。」³⁸

針對山西的特殊局勢，省黨部書記長黃樹芬對國民黨在晉工作方針也有所設計：一、改變閻氏作風，擁護閻氏堅定中央立場，不為中共所引誘；二、加強並協助晉閻對犧盟會中，非中共黨員的統制能力，解決省黨部、三青團內人事糾紛；三、扶植與策動舊派人士大團結，肅清中共在各正規軍中的活動與潛伏分子，派遣同志分任各正規軍要職；四、利用閻之軍政勢力，使黨政軍配合一致，監視中共非法活動，與之爭取民眾。³⁹總的來說，黃的宗旨是拉攏晉閻，共同消解中共力量。從之後事態發展來看，黃樹芬的計畫效果並不理想。閻錫山雖與中共合作關係破裂，但國民黨向山西的勢力滲透也很有限，並為日後中央對黃的立場信任埋下隱患。

晉西事變爆發後，同志會與犧盟會演成公開對立，蔣介石也愈發關注晉閻對共態度與犧盟會發展情形，並召見黃樹芬商談解決辦法。⁴⁰而閻錫山則趁此托黃向蔣索要槍械，藉以打倒犧盟會。徐永昌視閻如此是「以右制左」。⁴¹對此，蔣介石決定暫時先採取觀望態度：「對共黨此時當先嚴密防範，相機制裁。」⁴²但隨後，蔣亦擔心晉綏軍在中共壓力下難以為繼，遂調派兩個師的兵力予以援助，並在日記中感歎：「伯川思想與行動完全反對三民主義與中央，其背謬可笑，共黨焉能不輕侮暗算，然余仍支持之，未知其以後能悔悟否。」⁴³

³⁸ 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1939年10月28日，頁471。

³⁹ 〈黃樹芬呈蔣中正共黨在山西之活動及其勢力閻錫山態度及其應付方法〉（1939年12月1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20300-00049-048。

⁴⁰ 《徐永昌日記（第五冊）》，1939年12月15日，頁243；〈蔣介石日記〉，1939年12月16日；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編，《民國二十八年之蔣介石先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16），1939年12月21日，頁702。

⁴¹ 《徐永昌日記（第五冊）》，1939年12月26日，頁251。

⁴² 〈蔣介石日記〉，1939年12月25日。

⁴³ 〈蔣介石日記〉，1940年2月2日。

經此裂變，山西四分之三以上區域皆入犧盟會之手，不僅使閻錫山喪失精銳部隊三、四萬，槍二萬五千支，亦導致國民黨政治工作無法推進。⁴⁴1940年3月，中共中央主動採取與閻錫山相緩和的姿態，使閻共關係漸趨穩定。⁴⁵但閻氏更加重視組織的作用，集中力量建設同志會。⁴⁶在人事上，閻自任會長，趙戴文任副會長，並由13名人員組成高級幹部委員會。值得注意的是，同志會高幹會議五個處的主任均是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執委。⁴⁷同志會不僅自為獨立的組織系統，高級幹部亦橫跨國民黨，對省黨部予以監控，使國民黨山西省黨部的運作受到嚴重干擾。黃樹芬曾致電朱家驊：「主任委員即為同志會副會長，亦將步黨政分會、特別黨部政治部之後塵，徒仰他人之鼻息而已。頃據報告，同志會近曾決議對付本黨之辦法，決議派人打入本黨各級組織，以作第五縱隊之活動。對上級拉攏，對下級打擊，會議記錄另呈閻、趙。」⁴⁸對於黃的彙報，朱並未做出回應。

而在組織上，對應行政系統的專區、縣、區、村四級，閻錫山在每級都設立了同志會，同時亦在軍隊、學校中大力發展會員。⁴⁹閻還下決心要將組織工作深入到鄉村：「必使我們的政權不存在時，尚能保存十分之一以上戶數同志奮鬥。」⁵⁰省黨部不得不向中央報告：「各縣組（同志會）政軍民並稱，黨毫

⁴⁴ 《徐永昌日記（第五冊）》，1940年3月16日、5月16日，頁295、320。

⁴⁵ 楊奎松研究認為，毛澤東等人依舊重視對閻錫山的統戰工作，擔心會把閻逼到國民黨中央一邊去。雙方之所以屢發衝突，甚至走向破裂，本質是利益之爭的結果，但也存在諸多不依雙方意志為轉移的複雜因素。最終，閻錫山與中共達成和解，雙方關係恢復穩定。中共放棄長治以南地區，長邯路以南的八路軍部隊陸續開始北撤，地方黨政機構和群眾組織骨幹亦隨軍北遷。參見楊奎松，〈閻錫山與共產黨在山西農村的較力——側重於抗戰爆發前後雙方在晉東南關係變動的考察〉，《抗日戰爭研究》，2015年第1期，頁33-39。

⁴⁶ 關於同志會的組織架構與歷史變遷，可參見牛貫傑，〈民族革命同志會初探〉，《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15年第9期，頁10-16。

⁴⁷ 各處主任分別是：秘書處王懷明，組織處梁敦厚（化之），宣訓處李江，政事處薄毓相，監察處邱仰濬。楊懷豐，〈閻錫山的民族革命同志會紀述〉，《山西文史資料》，輯11，頁49-50。

⁴⁸ 〈黃樹芬致朱家驊電〉（1943年1月8日），《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06-090，「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人事」。

⁴⁹ 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頁300。

⁵⁰ 山西省地方志辦公室、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閻錫山日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1941年9月7日，頁587。

不被重視。」⁵¹1944年，同志會成立六周年時，閻錫山更提出「五建」學說，即組、政、軍、經、教。⁵²所謂「組」，除字眼上的區別，實際與「黨」已別無二致，同志會成爲與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具有極大重合度與競爭性的地方政黨。

據黃樹芬報告，同志會還以精建會、敵工團、突擊團、視察處等爲外圍組織，派遣大批幹部赴鄉村活動。閻錫山在經濟上也給予大力支持，每縣發放經費數千元，更常使之代替第二戰區募集特別捐。而同志會的工作內容之一，便是與國民黨基層黨部爭奪對民運工作的領導權。⁵³自1940年起，閻方與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在第二戰區的摩擦事件頻繁發生，兩三個月內就高達數百件，其中大多因雙方對民運領導權的爭奪導致。黃樹芬向朱家驊彙報時，一方面對國民黨在晉控制力加以誇大：「實際黨在二戰區確已能起領導作用，今日形勢已足代過去共黨在二戰區之位置有過之。」另一方面，委婉建議中央在民運等問題上，應與閻保持妥協姿態：「以共黨之作風，尙以擁閻爲號召，何況我輩確實要爭取晉閻以爲我方之助乎。」⁵⁴

與國民黨奉行三民主義，效忠黨國的革命精神不同，同志會的中心思想是「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具有強烈的私屬性。楚溪春就曾向徐永昌述說山西幹部在閻錫山面前歃血爲盟的情事，徐此前雖略有耳聞，但從未置信：「今聞此，覺閻先生愈趨日暮途遠之景象。」⁵⁵據親歷者回憶：「閻錫山與日軍勾結，爲了表現與重慶蔣政權脫離關係，閻將第二戰區及山西省政府的關防印信均置而不用，而以民族革命同志執行部的名義發號施令。」⁵⁶上述說法中，閻是否僅是出於拉攏日方的目的尙不能坐實，但脫離國民黨另立組織的做法卻可被印

⁵¹ 〈王貢猷致朱家驊函〉（1943年5月13日），《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06-090，「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人事」。

⁵² 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第六冊）》，1944年2月16日，頁2206。

⁵³ 〈黃樹芬致朱家驊函〉（1941年3月16日），《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06-091，「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黨政軍情勢與省鈔問題」。

⁵⁴ 〈黃樹芬致朱家驊電〉（1940年8月28日），《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06-091，「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黨政軍情勢與省鈔問題」。

⁵⁵ 《徐永昌日記（第五冊）》，1940年4月26日，頁315。

⁵⁶ 楊懷豐，〈閻錫山的民族革命同志會紀述〉，《山西文史資料》，輯11，頁54。

證。如在具有同志會機關報性質的《革命動力》與《革命行動》兩種刊物上，均嚴格按照「民族革命同志會執行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太原綏靖公署、山西省政府」的排序，發布組織命令或行政通告，完全未見「國民黨山西省執行委員會」的身影。

犧盟會組建之時，國民黨組織尚未回歸山西。而閻錫山擺脫犧盟會，另造同志會之際，山西省黨部已恢復工作。同一地區，兩套組織並行發展，無論在法理上，還是實際運作中，均具有較強互斥性。國民黨中央即便採取曖昧退讓路線，但在山西的處境也並未改變。1941年，黃樹芬再次向朱家驊大吐苦水：「晉省工作重要，處境特殊。因積極負責，他方頻施壓力，並易招內怨。黨務稍有寸進，同志會必先從下級予以工作上之打擊。如大排？等縣黨務糾察隊之糾紛，吉縣社會服務處產銷部之被封閉，工作同志之被殺害。」⁵⁷此後，中統方面也向中央續報了閻錫山所屬，擅捕黨工、侵佔縣黨部的情況。⁵⁸

閻錫山雖表面力言黨與國家不可分割，宣稱同志會是國民黨的外圍組織。但對國民黨的打擊依然如故，黨政失和達於極點。⁵⁹據統計，截至 1942 年 6 月，國民黨在山西共有黨員 24,924 人。⁶⁰而同一時期，同志會會員已達到八萬餘人。⁶¹徐永昌日記亦載：「晉軍官兵僅有六、七萬人，而其政治人員亦有六、七萬，恐怖逾昔。」⁶²1945 年 3 月，國民黨統計山西省黨員總數也僅為 51,483

⁵⁷ 〈黃樹芬致朱家驊電〉（1941年6月24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0，「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人事」。按：引文中的「排？」為原文。

⁵⁸ 〈山西閻錫山部摧殘黨團情形〉（1942年6月1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檔案館藏數位檔，《特種檔案》，檔號特 9/42.1。

⁵⁹ 〈王貢猷致朱家驊函〉（1943年5月13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0，「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人事」。

⁶⁰ 國民黨統計資料的真實性雖尚待考察，但為體現黨員招募成績，上報資料也僅存在虛高的可能。〈十中全會中央組織部工作報告〉（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三十一年十一月），收入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頁 480。

⁶¹ 楊懷豐，〈閻錫山的民族革命同志會紀述〉，《山西文史資料》，輯 11，頁 53。根據牛貫傑在〈民族革命同志會初探〉一文中徵引的山西數縣縣志所載同志會人數推算，亦可基本證實同志會會員遠超國民黨山西省黨部黨員人數。牛貫傑，〈民族革命同志會初探〉，《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15 年第 9 期，頁 10-16。

⁶² 《徐永昌日記（第七冊）》，1943 年 6 月 17 日，頁 105。

人。⁶³若單純以各方發展成員人數評估組織規模與效能的話，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已遠居於同志會之下。

四、黃樹芬：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紐帶

抗戰期間，國民黨中央不僅為謀求黨組織在晉生存發展煞費苦心，對於中層幹部的運用與管理也頗費心力。1938年10月至1944年2月，國民黨山西省黨部主任委員始終由趙戴文擔任，但閻方採取包而不辦的態度，黨務發展職責實際落到書記長黃樹芬身上。誠如上文所述，山西黨務受主客觀環境所限，組織效能不彰。但黃樹芬作為中央直接派駐山西的重要幹部，以省黨部為陣地，在密切蔣閻關係、地方黨政軍聯繫，甚至監視晉閻動向等諸多方面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張厲生曾對朱家驊明言：「查山西人選最難物色，蓋自十九年以來，凡接近閻先生者，皆不敢接近中央，其接近中央者，皆閻先生所不信任。」⁶⁴這不僅道出了國民黨中央在經營山西人際關係上所面臨的困難，也預見了國民黨山西省負責人將遭遇的處境。但黃樹芬憑藉自己獨特的處事技巧，以省黨部書記長的身分不僅成功接近了閻錫山，更成為蔣、閻間的聯絡人。1939年11月，黃回渝彙報工作時，閻曾特意致函蔣介石：「黃委員樹芬在此間工作甚為努力，尤其在黨政間調□之力甚大」，「鈞座如有垂詢，黃委員均能詳呈，鈞座如有指示，亦請由黃委員轉示」。⁶⁵閻錫山如此為之，不僅是在蔣面前替黃樹芬美言，更意在表明對黃的肯定與信任。

⁶³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所編制的黨務統計報告〉（1945年4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號711（4）-122。

⁶⁴ 〈張厲生致朱家驊函〉（1938年8月28日），《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06-090，「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人事」。

⁶⁵ 〈閻錫山函蔣中正現黃樹芬回重慶報告工作如有指示亦可由其轉示〉（1939年11月11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618-037。

黃樹芬雖是國民黨派駐山西的幹部，但閻錫山也有意對其拉攏、利用，通過黃試探蔣介石與國民黨中央對共態度，兼及表達己方訴求。例如，針對中共在晉動員民眾、發展組織、擴充武力的現實情況，閻氏希望中央能夠事先在中共活動據點布置重兵，「在抗戰意義上為建立游擊根據地，在剿共或防共上對共黨主要區域採取一種包圍之形勢」。閻還希望中央能夠幫助武裝、增強山西正規軍力量，如原晉綏軍的精銳部隊，由陳長捷與王靖國分別統率的第六十一軍、第十九軍。此外，為謀求晉省黨政軍、中央與地方緊密聯繫，閻亦欲蔣介石能夠派遣一名聯絡員常駐第二戰區，密切與各方關係，減少誤會。⁶⁶但此後，中央似乎並未正式派遣聯絡員赴晉，而是由黃樹芬實際扮演了這一角色。又如 1940 年 4 月，「省鈔跌落，糧價飛漲，民食、軍糧兩感困難」，山西財政狀況難以為繼。閻錫山亦派黃樹芬回渝，向蔣介石彙報彼間情形，請求經濟援助。⁶⁷

閻錫山與國民黨雖在防共、抗日問題上具有一致性，但雙方也潛存一種競爭、互斥關係。山西一直被視為閻氏統治下的獨立王國，抗戰爆發後，中央軍入晉無疑對晉閻的軍政權力空間造成擠壓，也使得閻、蔣關係變得微妙而又脆弱。自 1940 年起，第六十一軍軍長陳長捷作為閻錫山昔日的左膀右臂，因漸有親近國民黨中央的傾向，加之晉綏系內部權力鬥爭，使閻對陳大為不滿，以致陳漸不被容。隨後，閻錫山便欲借陳長捷與薄毓相衝突一事，將陳提送重慶，交蔣介石處置。黃樹芬分析閻之目的在自我表白與肅清隊伍，為維護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計，建議蔣萬不能使陳遠離前線，以免節外生枝。蔣採納了黃的建議，對陳長捷加以慰勉，令其安心殺敵。⁶⁸與此同時，中央軍與晉綏軍間矛盾也日趨激化，雙方就晉東南地區的控制權爭奪激烈。閻錫山便命黃樹芬與省府委員

⁶⁶ 〈黃樹芬呈蔣中正共黨在山西之活動及其勢力閻錫山態度及其應付方法〉（1939 年 12 月 1 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20300-00049-048。

⁶⁷ 〈閻錫山呈蔣中正山西省鈔跌糧價漲擬加調整並派黃樹芬謁陳詳情〉（1940 年 4 月 24 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80200-00291-076。

⁶⁸ 〈黃樹芬電蔣中正懇電閻錫山飭勿將陳長捷送中央審辦並加慰勉等文電日報表等三則〉（1940 年 9 月 8 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80200-00526-029。

李江代表黨政方面，前往謀求解決辦法。爲此，黃也特別向蔣介石表示：「晉東南形勢重要，國軍與地方當局應如何取得密切聯絡確爲重要問題。」⁶⁹

上述僅是黃樹芬參與解決的閻錫山與國民黨間的兩起摩擦，雖均被化解，但雙方間的關係裂痕業已加深，愈發增強了晉閻的離心傾向。1941年4月，《日蘇中立條約》簽訂，5月中條山戰役國軍失利，國際國內環境的突變更促使「先愛己後愛國」的閻錫山開始重新考慮未來出路問題。閻曾對左右坦言：「將來收拾國家，共黨有三分，汪偽有二分，中央祇有一分。」⁷⁰然而，晉閻與中共的合作經犧盟會的實踐已知走不通。於是，閻錫山此時選擇了與正向其拋出橄欖枝的日本妥協。

蔣介石於該年4月起，開始對閻錫山的通敵動作予以重視，但始終處於半信半疑的觀望狀態。直至7月底，局勢愈發嚴峻，蔣再也無法泰然處之，直接將軍令部部長徐永昌派赴山西打探虛實，並希望能對閻氏進行勸誡。徐雖出身晉系，但一直對閻錫山欲脫離中央而自立的傾向抱持消極態度，更毋庸說此時的投日之議。除徐永昌外，蔣介石此時還通過其他渠道密切關注著閻、日合作動向，以便全面掌握情況，妥善制定對策。1941年10月，黃樹芬便通過朱家驊向中央密報：

汪逆兆銘派人入晉，多方煽動。在敵特務機關長大清本主持之下，以蔡逆熊飛、閻特務人員白太冲等為媒介，曾與閻所派之趙總司令承綏及偽蘇省長體仁等在孝義開會三次，有進行妥協之準備。其內情因受政治影響，自日蘇協定之後，中共逐次在軍事有與敵偽合流可能，繼以中條山戰事爆發，據敵宣稱將渡河攻取西安。在此種形態之下，閻深感晉綏軍存在將成問題，故有一部份特別強調存在即目的之口號，其意即只要能存在，與汪逆合流亦可。⁷¹

⁶⁹ 〈黃樹芬電蔣中正九日與楚溪春李江赴洛陽晉見衛立煌商討駐晉東南之國軍如何切取聯絡並渡河視察〉（1940年12月17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80200-00293-046。

⁷⁰ 《徐永昌日記（第六冊）》，1941年6月21日，頁138。

⁷¹ 〈黃樹芬致朱家驊電〉（1941年10月5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23-559，「人才人事：黃樹芬」。轉引自賀江楓，〈1940-1942年閻錫山與「對伯工作」的歷史考察〉，《抗日戰爭研究》，2017年第4期，頁111。

12 月時，黃樹芬又直接致電蔣介石，報告自該年 8 月以來晉閻動向。據黃了解，閻錫山確派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山西黨政分會秘書長梁綬正、綏署機要處長劉迪吉與閻之親戚徐咸壽等人前往太原、平津，與日方代表會晤，謀求妥協。且自趙承綬抵達太原後，敵人當即自汾城撤退，改由晉綏軍進駐。前線各地凡與敵人接壤部隊均已取得默契，互不相犯，高級軍官間亦有秘密往來。11 月，當敵人進佔施灘時，克難坡雖與之相距甚近，但不僅未發生恐慌，更阻止國軍渡河增援。此外，第二戰區散布在川陝的眷屬、工廠、機關、銀行等單位，均已遷至隰縣、大寧、吉縣及前線各地。綜觀第二戰區的各種動態，黃樹芬認為閻錫山顯然已有與敵方妥協趨勢。⁷²

黃樹芬還結合自身在前方的觀感，向蔣分析閻氏投日動機：首先，美日談判使閻誤認為中央有與日妥協的可能，故欲搶佔先機，與敵接近。其次，中共在晉勢力日益擴大，閻自覺即便將來日軍撤退，晉綏軍也無力與之爭奪地盤。再者，閻方感受到來自中央各部隊與各方對山西的歧視。並且，晉地社會已出現糧食匱乏、生活成本益高的現象。此外，閻也出於政治博奕的考量，以及受到在香港的民主同盟等氣氛的影響。黃樹芬在報告中還向蔣預測了晉閻未來發展的幾種趨勢：一、晉綏軍不但無力抗日，且會更加與日方接近；二、若美日談判成功，日本必支持晉閻，造成華北特殊化環境；三、若談判失敗，日本為抽兵南進，亦必將佔領區逐移晉綏，以消滅國軍攻擊；四、盡力阻止中央軍入晉，以造成中立地帶。⁷³

1941 年底，美日談判破裂後，局勢發生扭轉，使閻錫山擱置了投日計畫，山西危機得以暫時解除。黃樹芬再次向蔣介石報告，閻在朝會上公開承認先前對美日關係估計有誤，並表示擁護中央抗戰到底的堅定立場。黃更自我表功稱閻的這一舉動是經其建議，但也提醒蔣不可對山西局勢掉以輕心。因日軍若集

⁷² 〈黃樹芬電蔣中正據報閻錫山確派趙承綬、梁綬正、劉迪吉、徐咸壽等潛入太原平津與敵會及汪兆銘代表會晤等〉（1941 年 12 月 11 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60100-00159-011。

⁷³ 〈黃樹芬電蔣中正據報閻錫山確派趙承綬、梁綬正、劉迪吉、徐咸壽等潛入太原平津與敵會及汪兆銘代表會晤等〉（1941 年 12 月 11 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60100-00159-011。

中力量對抗英美，將來恐會為防備國民黨而變本加厲地拉攏晉閻。同時，中共也欲利用這一時機，以援蘇抗日為名進佔太原，擴大活動區域。黃亦擔心中央軍與閻方再起摩擦，致使雙方關係惡化。因此，黃樹芬建議中央：一、促成閻錫山做出堅決抗日的表示，以絕後患；二、中央軍協助閻錫山收復太原，肅清中共勢力；三、儘量減少對第二戰區刺激。最後，黃還特別強調：「芬現住克，與閻趙日夕相處，時常進言。承渠等亦極坦白相告，對於中央與地方聯繫工作或能有所臂助耳。」⁷⁴

此後，日本改變了對閻錫山政治誘降的策略，轉為武力脅迫，使山西局勢再次陷入危機。據黃樹芬了解，1942年4月，閻錫山與日方代表會晤時，達成幾點共識：協力反共；日方幫助閻建立三十萬鐵軍；晉綏冀察歸閻支配。5月前後，黃又偵悉原駐紮於河西、洛宜各地直屬機關人員及重要物資均遷赴河東；第二戰區軍政高級幹部因生活艱苦、環境困難，均願回歸太原；閻錫山亦將脅迫或統制下級幹部返回太原。為此，黃樹芬向國民黨中央表示，將親赴前線謁閻觀察實況，作最後懇談，並運動閻之左右，勸說其懸崖勒馬，與敵中止談判。黃因聽聞蔣介石將赴西安，建議邀請閻氏往謁。此外，黃還提出使在渝久居之邱仰濬返晉，藉以加強蔣、閻聯繫，並命三十四集團軍於必要時進佔各重要據點，同時爭取晉閻內部不願附敵之軍政幹部等策略。⁷⁵而蔣介石對黃的建議也有所採納，決定邀請閻錫山赴陝一晤。⁷⁶

⁷⁴ 〈黃樹芬稱共黨正利用以援蘇抗日為名進佔太原擴大活動範圍與區域等〉（1941年12月12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60100-00159-012。

⁷⁵ 邱仰濬曾任山西五台縣長、平津衛戍司令部總務處處長、山西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等職，位居閻錫山「十三高幹」之一，深得閻氏信任。〈朱家驊呈蔣中正黃樹芬電稱據報閻錫山與敵代表會晤決定協力反共敵助閻建立三十萬鐵軍晉綏冀察歸閻支配等妥協經過及決定事項〉（1942年5月8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80103-00045-025。

⁷⁶ 《徐永昌日記（第六冊）》，1942年5月10日，頁395。

五、黃樹芬的困境

黃樹芬擔任山西省黨部書記長七年，在加強蔣閻聯絡、密切黨政軍關係、蒐集晉閻情報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孰料國民黨中央最終卻給其安上了破壞組織的罪名。1940年8月，黃樹芬突然致電朱家驊解釋：「惟因特殊，一切不得不顧及人事。因此，雖時有與二戰區接近，目的在借此人事感情以求達到黨務之開展，非有所欲。于二戰區更無所謂個人之得失，可絕對堅定本黨立場。」⁷⁷由此開啓了此後數年間，國民黨中央與黃樹芬反覆糾纏的所謂政治立場問題。

1941年，當黃樹芬致函朱家驊，伺機建議撤換執委郭澄，代之以閻系人士楚溪春時，朱已表露出對其有失立場的不滿：「工作之苦心甚佩，但彼常過分，應力勸其必須隨時注意本黨的立場爲要。」黃隨之表白於朱：「職自浙江以至交部、太原均在吾公領導之下，在芬之長官中可謂歷史最深長，知芬最深切者，芬之人格與立場必定知之有素。且公之左右，芬之友好極多，知芬亦較眾。」即便如此，朱家驊迫於客觀壓力，亦不得不時常提醒黃。但黃認爲：「晉省環境較他省爲複雜，敵僞奸黨之外，尚有僞裝分子與二戰區各部門之鬥爭。因此，進行之方式上必須講求，必須先選定敵人，分別緩急先後。集中力量少樹敵，從矛盾中求發展，由曲線中達目的。非如此，欲求存在，尚不可能，況望發展乎！」⁷⁸

黃樹芬所言「僞裝分子」實指在晉 CC 系勢力。中原大戰前，山西黨務由以苗培成爲代表的 CC 系人士負責。抗戰爆發後，國民黨重回山西時，中央黨務代理權已由朱家驊取代陳果夫、陳立夫掌握。據黃稱：「舊黨部派同志對此不獨不站在黨的立場予以幫助，近復組織晉社，以〔姚〕大海爲總負責人，聯絡舊日黨部同志而有所企圖，以推翻現黨部爲目的。」姚大海等人的主要策略

⁷⁷ 〈黃樹芬致朱家驊電〉（1940年8月21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1，「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黨政軍情勢與省鈔問題」。

⁷⁸ 〈黃樹芬致朱家驊函〉（1941年6月13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0，「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人事」。

是以該方控制的、隸屬於國民黨山西省黨部的調查統計室為陣地，與閻錫山方面製造事端。「彼等復乘職去渝期間，更有所策動。二三月來，各地與二戰區摩擦事件多至數百。」使得閻氏對於各地黨部的糾紛事件甚感不快，「幾疑今之黨部猶如舊日，致吾公恢復黨部之苦心未能大顯。職對於此點，對閻雖不敢明言，但閻深可信職決無故意製造摩擦之理」。⁷⁹

黃樹芬為彌合雙方關係裂痕，遂更加表現出對閻氏的密切聯絡。而 CC 系便又以立場動搖為名向中央控告黃，致使後者再次向朱家驊申訴：

至於言行方面，立場尤為堅定。此間黨部與地方當局，固表面上不得不加聯繫，實以立場不同，暗鬥尤烈。惟在先求存在，及增加上級之處理困難原則之下，充分講求鬥爭技術，壁壘至嚴，即芬素主只要黨部大權操在我黨之手，即其他略事與之敷衍，亦未不可。⁸⁰

除來自 CC 系的攻擊，山西三青團方面對黃樹芬亦表示不滿：「未淪陷各縣，固且不能公開活動，黨與團之關係亦不甚融洽。如此次黃書記長代表山西支團赴渝出席團代大會，得力於二戰區幫忙者不少，而團方則深表反對者也。」⁸¹但朱家驊此時對黃尚較信任，仍向張治中推薦由其兼任三青團山西支團部幹事長。⁸²此外，朱系群體內部也對黃大加控訴：

（一）晉黨部工作鬆懈，所屬五十餘縣整年無工作報告。（二）黃行為不檢，態度隨便，中央代表評黃失立場，編消息、吃兩頭，為黨丟臉，晉人稱為黃狗。閻對黃使晉人，因彼見棄於本黨且可利用。今夏

⁷⁹ 姚大海，山西人，曾任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商民運動委員會常務委員、黨務指導委員、山西省黨部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山西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執行委員等職。1939 年起，擔任軍事委員會風紀巡查團委員，為 CC 系在晉代表人物。〈黃樹芬致朱家驊電〉（1940 年 8 月 28 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1，「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黨政軍情勢與省鈔問題」；劉國銘，《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頁 1787。

⁸⁰ 〈黃樹芬致朱家驊電〉（1943 年 1 月 8 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0，「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人事」。

⁸¹ 〈王貢猷致朱家驊函〉（1943 年 5 月 13 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0，「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人事」。

⁸² 〈朱家驊致張治中函〉（1943 年 5 月 11 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509，「三民主義青年團：人事介紹與任命」。

送黃萬元，派其赴渝交涉敵工團結費，無結果。閻不滿，兩月不見黃。趙言黃不學無術，人格道德失黨體面。（三）黃對部座不滿，用人不徵彼同意，經費限制等。⁸³

對此，朱家驊批示：「婉言懇電勸黃，並飭糾正一節，努力工作，全力以赴。否則，不能再予容忍而支持也。」⁸⁴面對朱的警示，黃樹芬難以接受，申言道：「惟對環境之運用，似應付與充分活用的機會與上級充分的信任，始能應付裕如。否則先求安定內部及鞏固地位尚且不夠，安有餘力向外發展。」⁸⁵

各方對黃樹芬「賣黨投機」行徑絡繹不絕的彙報，也逐漸動搖了朱家驊對其信任，開始命隴海路特別黨部人員許文樑密查。據許調查，黃不僅以書記長身分參加同志會高幹會議，更羅列出其誣陷同志、囤貨居奇、販賣毒品、私挪公款經商等數項罪狀：

（一）賣黨。閻高幹聯席會議，黃擅以書記長地位參加，遂使同志會有合法地位。（二）陷害。對調中訓團及黨訓班同志均加以罪名，如李玉材等。黃言為奸黨，牛明軒等來班報以未到區工作陷害，陳振家買鴉片被扣兩月，無據旋釋。（三）囤積。三十年一月移用經費，自西安購大批萬金油運宜川，囤至夏始賣，職員薪金因而遲發兩月。今年六月，黃派李保固運大批貨物路過韓城被扣。七月，在辦事處囤布四十餘匹，不知移於何處。（四）販毒。閻駐晉高級參謀王澤毅言確曾販毒被軍所扣，並願以頭作證。（五）經商。以省黨部代電迫督導員各出三千二百元、縣書記長各出二千四百元，交伊經商。（六）生利。晉各區經費每遲一月發存銀號生利，暗仍由李怡望負責。中央款到西安中央銀行後，由其弟黃清渠出面移存私人銀號，希圖重利。黃

⁸³ 〈許文樑、高挺秀、曹德峻致朱家驊電〉（1942年11月27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0，「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人事」。

⁸⁴ 〈朱家驊批示〉（時間不詳），《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0，「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人事」。

⁸⁵ 〈黃樹芬致朱家驊函〉（1942年11月29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0，「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人事」。

親稱在通商銀行有戶頭。(七)省黨同志向閻借麥。(八)應領中央米代金既不發亦不還，晉閻留以長飽。⁸⁶

獲悉這一情況的朱家驊，震驚之餘更訓斥許：「此等機密之事何可輕用部中普通密碼拍來，引起誤會不少，殊屬疏忽之至。以後遇有機密文電必須借用國魂兄之專用密本為要。」⁸⁷朱家驊雖已知曉黃樹芬在晉惡劣行徑，但因彼時正值與 CC 系勢力對抗的緊張之際，為避免貽人口實，朱暫時未對其加以處置。

各方對黃樹芬的控告雖有派系攻擊之嫌，但也並非捕風捉影。除客觀形勢需要，黃與晉閻勢力過從甚密，亦有謀求自身利益的主觀動機。1943 年 4 月，黃曾向徐永昌談及：「趙先生自謂今年必死云云。」⁸⁸果不出其所料，趙戴文於該年年底病故。隨後，省黨部包括閻系人士在內的 9 名執委聯名向中央舉薦由黃樹芬繼任。⁸⁹黃亦大膽向朱家驊自薦：「此次晉省主委出缺，論歷史與環境，確以芬繼任為相宜，此事關係芬之前途至大，想吾公必定出全力予以支持。」⁹⁰此時，黃樹芬尚不知朱對其早已喪失信任，僅是等待時機予以處罰而已，又怎會對其再加以拔擢。並且在此之前，朱家驊業已向蔣介石舉薦了前天津市黨部主委王若僖。⁹¹但朱卻回覆黃：「吾兄在晉省工作多年，素著績效，況由弟一再力為成全。此事弟早已計及，總裁現正考慮人選也。」⁹²

⁸⁶ 朱家驊檔案中，尚有多份有關黃樹芬涉嫌經濟問題的密報。〈許文樑致朱家驊電〉（1943 年 9 月 3 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0，「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人事」。

⁸⁷ 〈朱家驊覆許文樑電〉（1943 年 10 月 2 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0，「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人事」。

⁸⁸ 《徐永昌日記（第七冊）》，1943 年 4 月 29 日，頁 71。

⁸⁹ 〈王友蘭、胡作礪、喬鵬書、武誓彭、邱仰濬、李江、楚溪春、梁敦厚、薄毓相等九人致朱家驊電〉（1944 年 2 月 16 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3，「山西黨務：趙次隴病故後之晉省主委人選問題」。

⁹⁰ 〈黃樹芬致朱家驊電〉（1944 年 2 月 23 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3，「山西黨務：趙次隴病故後之晉省主委人選問題」。

⁹¹ 〈朱家驊簽呈總裁〉（1944 年 1 月 18 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3，「山西黨務：趙次隴病故後之晉省主委人選問題」。

⁹² 〈朱家驊覆黃樹芬電〉（1944 年 2 月 25 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3，「山西黨務：趙次隴病故後之晉省主委人選問題」。

朱家驊對王若僖的簽呈，蔣介石曾批示「可」，但隨即又電話指示朱，須再加考慮。⁹³數日後，侍從室告知朱，該處接到中央監察委員姚大海上呈蔣的一封信內稱：「數年來山西黨務，閻長官不存愛護之意，省黨部書記長黃樹芬極力逢迎。□□中央付與之使命，日惟陷害忠實同志，以博閻之歡心。」⁹⁴蔣介石應是因此封控函改變主意，最終欽定具有 CC 系背景的韓振聲繼任主委，並要求撤換書記長黃樹芬。韓籍屬山西，也曾擔任過天津市黨部主委，若不考慮派系背景，確較朱家驊所薦浙人王若僖更為合適。

中央雖已內定韓振聲出任主委一職，但遲遲未見公開發表。閻錫山方面態度也從絕對由黃樹芬繼任，轉變為可由黃或由閻錫山、楊愛源擔任。不明內情的黃樹芬再次致電朱家驊：

有人建議閻長官對黨部應採取統制或包而不辦態度，主委名義應由閻長官或楊副長官兼任。在渝某部長亦有來電作此建議，且謂芬非中委，不能擔任。但閻長官以此事前既當面允許由芬繼任，復在各委員面前一再說明，似未便改口。昨芬因知閻將赴前方，故親往晉謁，當承面示：此事已電覆賈部長，請其再行轉告鈞座。⁹⁵

黃樹芬認為若主委必須由中央委員擔任，則山西僅有閻錫山與楊愛源二人符合條件，「中央如另提他人，則彼不能同意，定加拒絕。以免引起未來黨政之糾紛等語。」但又恐若由閻、楊擇一兼任，「晉省黨部工作進行之方式必採與同志會平行，或類如特別黨部、政治部等之維持名義為已足。如此可使芬十數年來苦心孤詣為黨樹立之基礎，以及千百本黨堅強幹部，必趨逐漸瓦解。」⁹⁶因而，黃樹芬自認是最佳繼任人選。朱家驊對此未親做回覆，命秘書沙孟海代勞：

⁹³ 〈朱家驊簽呈總裁〉（1944年2月19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3，「山西黨務：趙次隴病故後之晉省主委人選問題」。

⁹⁴ 〈侍從室第三處致朱家驊函〉（1944年2月27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3，「山西黨務：趙次隴病故後之晉省主委人選問題」。

⁹⁵ 〈黃樹芬致朱家驊電〉（1944年3月7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3，「山西黨務：趙次隴病故後之晉省主委人選問題」。

⁹⁶ 〈黃樹芬致朱家驊電〉（1944年3月7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3，「山西黨務：趙次隴病故後之晉省主委人選問題」。

「驩公未有不支持吾兄，惟事之成否正不可知，鄙意兄此時稍靜默為宜。」⁹⁷另一方的閻錫山也並未如黃所言，對其有所舉薦，而是命賈景德出面向朱家驊建議由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楊愛源接充主委。⁹⁸

1944年3月，許文樑再次向朱家驊密報：「邇來黃親信趙璧全成立小組組織，將我黨訓班同志排斥圈外。並作有計劃之打擊，擬在三月底召開該小組組織基幹會上決定。查黃在晉之種種劣跡，筆難罄述。祇侵吞公款一項，即在三百萬元以上。前黃在孝義出小麥七石，買十一二歲小丫頭一名。渠何來鉅資，不問可知。現閻對黃亦不滿，而黃欲運動做主委，群情憤極。」對此，朱家驊批示先密交秘書甘家馨一閱。⁹⁹月餘之後，朱才手諭免去黃樹芬書記長兼職，使其僅專任執委。¹⁰⁰但考慮到外界觀瞻，朱仍對黃有所維護，向外宣稱為主動辭職。¹⁰¹

1944年5月，國民黨五屆十二中全會後，朱家驊卸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黃樹芬也失去了高層庇護。7月，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以「破壞組織」罪的名義，對黃進行立案審查。¹⁰²最終，黃樹芬亦被迫辭去山西省黨部執委一職。¹⁰³

⁹⁷ 〈沙孟海覆黃樹芬電〉（時間不詳），《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3，「山西黨務：趙次隴病故後之晉省主委人選問題」。

⁹⁸ 〈賈景德致朱家驊函〉（1944年1月23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3，「山西黨務：趙次隴病故後之晉省主委人選問題」。

⁹⁹ 〈許文樑致朱家驊電〉（1944年3月9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3，「山西黨務：趙次隴病故後之晉省主委人選問題」。

¹⁰⁰ 〈朱家驊手諭〉（1944年4月14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3，「山西黨務：趙次隴病故後之晉省主委人選問題」。

¹⁰¹ 〈朱家驊致胡作礪電〉（1944年4月22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3，「山西黨務：趙次隴病故後之晉省主委人選問題」。

¹⁰² 〈山西黃樹芬破壞組織案〉（1944年7月2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檔案館藏數位檔，《監察檔案》，檔號監 0865。

¹⁰³ 〈黃樹芬辭職信〉（1944年7月25日），《朱家驊檔案》，檔號：301-01-23-559，「人才人事：黃樹芬」。

六、結 語

抗戰爆發後，省黨部的恢復標誌著國民黨政權得以重新進入山西，但也使蔣介石開始備受人事問題的困擾。如何在不引起閻錫山反感的前提下，盡最大可能恢復組織、發展黨員與平衡雙方勢力，均受人事布置的影響很大。前人對於閻錫山與蔣介石或國民黨中央的關係研究，大多是從軍事、外交、財政等視角展開，而對雙方間圍繞國民黨山西省黨部組織與人事問題的博弈則關注較少。因此，本文從這一角度切入，對抗戰時期的蔣閻關係再進行探討。

其實，蔣介石對山西黨務並未抱有太高期許，所求的僅是希望能夠通過設置省黨部，有助於維持晉閻與中央的合作抗日關係。因此，蔣介石不僅對閻氏的諸多人事要求均予以最大限度的滿足，更儘量克制而不干涉其在山西勢力與組織的發展，並以此作為國民黨中央處理與晉閻關係的基本態度與策略。

俗語云：「在其位，謀其政。」與集國民黨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總裁蔣介石的著眼點不同，抗戰時期先後出任中央黨部秘書長、中央組織部部長的朱家驊所考慮與追求的是基層黨務的發展績效，與自身派系隊伍的擴張。因而，從某種角度來看，在這種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也同時交織著國民黨內部派系勢力的角逐。於是，在蔣制定的對閻路線框架下，朱試圖最大化地推進在晉黨務與拓展己方力量。由此，不可避免地對蔣介石的旨意時有違背，而引起蔣對山西人事的直接干涉，和對組織部工作計畫的修正。事實上，抗戰期間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受客觀環境制約，所發揮的效能也十分有限。某種程度上，作為國民黨中央對晉閻監視機構的表現更為突出。

將山西視為安身立命之所的閻錫山，為維護自己的獨立王國，決定效仿中共在毗鄰的陝西的做法，重視鄉村、建立組織、確立思想。抗戰前，犧盟會是閻錫山大膽實踐的開始。晉西事變的發生不僅沒有澆滅閻對發展組織的熱情，反而更加強化了其對組織效用的信心。同志會便是閻錫山戰時為擺脫中共力量，建立的第二個犧盟會。閻錫山表面對國民黨中央宣稱同志會是為對抗犧盟

會而建，但其實際也成為國民黨在山西發展的最大阻礙與競爭者。正因閻對「組織」的重視，使其在掌握山西軍、政大權的同時，仍不放鬆對組織與民眾思想的控制。閻錫山之所以僅在山西省黨部內位置私人，未爭奪黨務領導權，謀虛而不務實，則在於其已自發建立了一套與國民黨並行的組織系統，搶佔了政治資源。

抗戰期間，急劇變動的外部環境多次衝擊著蔣、閻的合作抗日關係。中央軍與晉綏地方軍發生衝突，閻錫山與日本密謀妥協等緊要關頭，蔣介石除對晉閻施予政治、軍事手段外，亦希望能夠通過無形的人事斡旋來處理危機。制度是靜止的，人則是靈活變通的。人情往還可以化解制度約束或突發事件，給雙方間緊張關係所帶來的摩擦。在這一過程中，國民黨山西省黨部書記長黃樹芬扮演了重要角色，成功地在蔣、閻之間傳遞訊息，及時向中央彙報地方動態。

然而，黃樹芬也是國民黨中央與晉閻博弈關係中的犧牲品。在貫徹中央對閻路線時，黃需要拿捏分寸，亦需具備靈活的處事技巧，方能生存。稍有不慎便會陷入「同志疑其親閻，閻方病其煩碎」的困境。¹⁰⁴黃樹芬自認只要黨部權力在握，對閻錫山一切要求均可敷衍，甚至忽視了書記長的本職工作，即國民黨在山西的基層黨務建設任務。這種過於活用職權的行為，似乎也有違朱家驊的期許。

黃樹芬身處如此複雜的環境中，亦不能做到一心為公，不僅私挪公款以投機經商，更企圖利用閻、朱兩方力量，作為自身升遷的政治資本。黃樹芬在左右逢源的過程中，既消耗掉了朱家驊對其的信任，又未能真正獲得閻錫山的承諾，獵取主委的美夢最終落空。朱氏因黃數年來確實向中央輸送了大量一手情報，並提供了不少中肯建議，使其姑且能夠相信這位舊屬對中央的忠誠立場。但黃樹芬貪汙腐化劣跡也觸及了朱用人原則的底線，雖為避免授人以柄，朱選擇低調處理，然而，在國民黨激烈的派系鬥爭環境中，黃終究未能逃脫來自他方的攻訐。黃樹芬嚴重的經濟問題本有案可稽，最終被較難界說的破壞組織罪追究問責，不僅說明「立場問題」對黨工政治生命的毀滅性，亦反映出戰時閻錫山與國民黨之間的貌合神離，與難以彌合的關係裂縫。

¹⁰⁴ 〈翟韶武致朱家驊函〉（1941年8月2日），《朱家驊檔案》，檔號 301-01-06-090，「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人事」。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

《朱家驊檔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 「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人事」，檔號 301-01-06-090。
- 「山西黨務：趙次隴擔任主委時期：黨政軍情勢與省鈔問題」，檔號 301-01-06-091。
- 「山西黨務：趙次隴病故後之晉省主委人選問題」，檔號 301-01-06-093。
- 「各省市路黨部人事分析」，檔號 301-01-06-295。
- 「三民主義青年團：人事介紹與任命」，檔號 301-01-06-509。
- 「人才人事：黃樹芬」，檔號 301-01-23-559。

《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

- 〈賀耀組、戴笠致蔣中正電〉（1939年4月29日），典藏號 002-080200-00522-024。
- 〈閻錫山函蔣中正現黃樹芬回重慶報告工作如有指示亦可由其轉示〉（1939年11月11日），典藏號 002-080200-00618-037。
- 〈黃樹芬呈蔣中正共黨在山西之活動及其勢力閻錫山態度及其應付方法〉（1939年12月1日），典藏號 002-020300-00049-048。
- 〈閻錫山呈蔣中正山西省鈔跌糧價漲擬加調整並派黃樹芬謁陳詳情〉（1940年4月24日），典藏號 002-080200-00291-076。
- 〈黃樹芬電蔣中正懇電閻錫山飭勿將陳長捷送中央審辦並加慰勉等文電日報表等三則〉（1940年9月8日），典藏號 002-080200-00526-029。
- 〈黃樹芬電蔣中正九日與楚溪春李江赴洛陽晉見衛立煌商討駐晉東南之國軍如何切取聯絡並渡河視察〉（1940年12月17日），典藏號 002-080200-00291-076。
- 〈黃樹芬電蔣中正據報閻錫山確派趙承綬、梁緬正、劉迪吉、徐咸壽等潛入太原平津與敵酋及汪兆銘代表會晤等〉（1941年12月11日），典藏號 002-060100-00159-011。
- 〈黃樹芬稱共黨正利用以援蘇抗日為名進佔太原擴大活動範圍與區域等〉（1941年12月12日），典藏號 002-060100-00159-012。
- 〈朱家驊呈蔣中正黃樹芬電稱據報閻錫山與敵代表會晤決定協力反共敵助閻建立三十萬鐵軍晉綏冀察歸閻支配等妥協經過及決定事項〉（1942年5月8日），典藏號 002-080103-00045-025。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檔案館藏數位檔

- 〈山西閻錫山部摧殘黨團情形〉（1942年6月12日），《特種檔案》，檔號特 9/42.1。

〈山西黃樹芬破壞組織案〉（1944年7月27日），《監察檔案》，檔號監 0865。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所編制的黨務統計報告〉（1945年4月），檔號 711（4）-122。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南京：鳳凰出版社，1998。

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下）》，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3。

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

劉國銘，《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

劉壽林等編，《民國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95。

二、日記、回憶資料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山西省地方志辦公室、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閻錫山日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五、六、七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李冠洋，〈中國國民黨山西省黨部簡述〉，收入《山西文史資料》編輯部編，《山西文史資料全編（第1卷）》，太原：《山西文史資料》編輯部，1998。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編，《民國二十八年之蔣介石先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16。

康澤，《蔣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黨衛軍」魁首康澤自述》，北京：團結出版社，2012。

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程子華，《程子華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

楊懷豐，〈閻錫山的民族革命同志會紀述〉，《山西文史資料》，輯 11，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65。

三、專著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山西通志·政法志警察篇》，北京：中華書局，1999。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山西通志·黨派群團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

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吳振漢，《國民政府時期的地方派系意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

- 季林 (Gillin, D. G.) 著, 牛長歲等譯, 《閻錫山研究——一個美國人筆下的閻錫山》, 哈爾濱: 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1990。
- 曾華壁, 《民初時期的閻錫山 (民國元年至十六年)》, 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1981。
- 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 《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 (第五、六冊)》,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8。

四、論文及專文

- 牛貫傑, 〈民族革命同志會初探〉, 《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 2015 年第 9 期, 頁 10-16。
- 王奇生, 〈閻錫山: 在國、共、日之間博弈 (1935-1945)〉, 《南京大學學報 (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 2018 年第 1 期, 頁 87-104。
- 金以林, 〈寧粵對峙前後閻錫山的反蔣倒張活動〉, 《近代史研究》, 2005 年第 5 期, 頁 50-89。
- 馬思宇, 〈有財斯有兵——1928~1930 年蔣閻關係再解讀〉, 《史學月刊》, 2016 年第 8 期, 頁 76-84。
- 馬義平, 〈民國時期山西黨政關係演變管窺——以山西省黨部委員構成為例〉, 《歷史教學》, 2009 年第 12 期, 頁 26-30。
- 張冠軍, 〈犧盟會與共產黨及閻錫山政權關係之辨誤〉, 《晉陽學刊》, 2005 年第 4 期, 頁 7-9。
- 賀江楓, 〈1940-1942 年閻錫山與「對伯工作」的歷史考察〉, 《抗日戰爭研究》, 2017 年第 4 期, 頁 99-126。
- 黃天華, 〈抗戰期間閻錫山與日本的關係及國共兩方的因應〉, 《民國研究》, 輯 22,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2, 頁 154-164。
- 楊奎松, 〈閻錫山與共產黨在山西農村的較力——側重於抗戰爆發前後雙方在晉東南關係變動的考察〉, 《抗日戰爭研究》, 2015 年第 1 期, 頁 4-39。
- 趙妍杰, 〈穆光政之死: 九一八事變後蔣、閻關係之變動〉, 未刊稿。
- 劉文楠, 〈尋找理想的中央—地方關係——蔣介石與晉綏地方實力派的博弈 (1931-1934)〉, 《史林》, 2015 年第 5 期, 頁 139-155。

The Guomintang's Provincial Party Headquarters in Shanxi: A Study of Organization and Personnel, 1938-1944

Liang Xinlei*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as established between Yan Xishan and the Guomintang (GMD, Kuomintang), to make it possible for the GMD to return to Shanxi Province. However, Yan Xishan's forces that circled between the GM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Japan also spontaneously formed an organization with the nature of a local political party,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Comrades' Association, to compete with the forces of all parties. In order to maintain cooperation with Yan, Chiang Kai-shek tried to make greater concessions in matters such as party affairs development and personnel dispatch in exchange for the stability of Yan's side. In this process, Huang Shufen, the Secretary of the GMD's Shanxi Provincial Party Departmen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trengthening ties between Chiang and Yan, reconcil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Part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rmy in Shanxi, and resolving local conflicts. In addition, the investigation of Huang Shufen's personal career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GMD's middle-level Party cadres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tension of the war situation, the strong centrifugal tendency of the local power factions, and even factional struggles within the GMD.

Keywords: Yan Xishan, Chiang Kai-shek, the Comrades'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Revolution, Provincial Party Headquarters in Shanxi, Huang Shufen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